

The Evaluation of ●●●●
Active Fiscal Policies in China: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价
—— 一种实证视角

王志刚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The Evaluation of ●●●●
Active Fiscal Policies in China: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价
——一种实证视角

王志刚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价:一种实证的视角/王志刚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41-2769-0

I. ①积… II. ①王… III. ①财政政策—政策效应—研究—中国
IV. ①F8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928 号

责任编辑:金 梅

责任校对:苏小昭

责任印制:李 鹏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价——一种实证的视角

王志刚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编辑室电话:881914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出版社网址:www. esp. com. cn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 开 14.75 印张 230 000 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2769-0 定价:3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王志刚博士的新作即将出版,对此我愿作序推介。志刚博士进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以来,一直致力于将现代经济理论和中国国情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取得可喜成绩。

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强调“经济学家必须进行更多有意义的经验研究”,尽管他一直避免使用数学语言来解释经济现象,但是他也特别指出“一旦我们发现了影响经济体系绩效的真实因素,因素间的复杂交互关系显然需要数学方法来处理”。王志刚博士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研究工作中善于运用现代数理分析工具,更难得的是他亦注意使用而不滥用这些工具,力求采取针对性强的合适的分析方法。本书反映了他多年来在政策研究尤其是政策效果评估领域孜孜以求的认识深化的结晶。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也遇到一系列问题,如何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并预见未来,相当不易。在中国发展实践中,政府的作用独一无二,然而对政府政策效果的评价才刚刚起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应该包括科学的决策、执行以及绩效评价并反馈,通过修正再进行新一轮的政策优化循环。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政府积极应对,积极财政政策也二次重启,向市场注入庞大流动性。这再次让人们思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定位与作用,如何评价已有的财政政策,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财政政策充分体现政府的意志和职能,对财政政策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要联系于对政府角色如何合理定位的分析,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这些经济学家对政府角色的不同分析,其实都表明政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政府之手要“因时因地”地发挥应有作用,一定要慎用百

姓之财,守正不偏,求绩不怠。具体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决非易事,一代代经济学人已经并在做着不懈努力,政策绩效的量化分析研究将有助于促进相关认识的深化与细化。

而且每一项政策都有短期和长期效应,尤其是后者,更需要历史来评判。尽管人们首先往往更多地看重短期效应,但这决不能否认政策研究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高度和足够长期的历史视野。

王志刚博士一直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着他的努力,尽管研究者总会有局限,但是毕竟难能可贵的是自己不懈的探索,并形成独到的见解和创新。希望他以后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2. 11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与发展	5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界定	5
1. 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	5
2. 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定位	6
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争论	7
三、财政政策在中国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	11
四、积极财政政策顺利实施的微观管理基础	12
第二章 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内容	18
一、国外经济形势	18
二、国内经济形势	19
三、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主要内容	24
1. 结构性减税	24
2. 规模庞大的 4 万亿公共投资	28
3. 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	29
第三章 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效果分析	31
一、结构 VAR (SVAR) 方法	31
1. 向量自回归 (VAR) 方法	32
2. 结构向量自回归 (SVAR) 方法	33
二、财政收支与 GDP 的 SVAR 模型	35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35
2. 结构化向量自回归 (SVAR) 模型	36
3. 小结	43
三、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互补还是替代	43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43
2. 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界定	45
3.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ECM)	46
4. 小结	51
四、政府消费支出和经济增长	51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51
2. 政府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误差修正 模型 (ECM)	53
3. 小结	56
五、政府投资和非国有经济投资：挤入还是挤出	56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56
2. 政府投资与非国有投资的误差修正模型 (ECM)	57
3. 小结	62
六、财税政策与信心指数：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提振信心	62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62
2. 信心理论	64
3. 财税政策和信心指数之间的 VAR 模型	66
4. 小结	75
七、财政政策的反周期性评价	75
1. 中国财政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的测算	76
2. 中国财政赤字的演变	78
3. 相机抉择政策的反周期性分析	85
4. 相机抉择和自动稳定效应比较	90
5. 小结	94
八、积极财政政策的其他影响效果 (2009—2010 年)	95
1. 扩大国内消费政策效果显著	96
2. 出口实现恢复性增长	98

3. 就业有所好转但形势依然严峻	103
4. 宏观经济先导指标预示经济逐步回暖	105
第四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和财政可持续性	111
一、财政风险界定	111
二、国际财政金融风险变化	115
三、危机以来中国财政风险浅评	118
1. 财政赤字率	118
2. 国债负担率	119
3. 居民应债能力（居民应债率）	121
4. 地方债务风险	122
四、财政可持续性检验	125
1. 理论分析框架	126
2. 实证检验模型	129
3. 债务动态模型	131
4. 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判断	132
5. 地方政府融资何去何从	142
6. 代际核算的启示	149
第五章 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淡出	154
一、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历史经验	154
二、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	156
1. 2011 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总体向好	157
2. 2012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下行压力大	158
3. 通胀压力情况反复	160
4. 经济结构转型任务艰巨	162
5. 粗放型能源投入方式不可持续	163
6.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165
三、未来国际财政政策调整	167
1. 全球财政政策调整的争论：紧缩还是不紧缩	168
2. 各国调整步伐不一	170

3. 各国经济政策协调	172
四、如何淡出积极财政政策	175
1.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原则	175
2.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策略	178
3. 2012 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82
4. 当前财政运行状况	191
5. 未来财政政策调整的方向	195
 第六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反思	198
一、政府、市场和不确定性	198
二、责任社会离不开负责任的政府与民众	200
三、效率与公平的两难困境	203
四、宏观政策与微观基础的结合	205
五、政策研究和计量经济学	207
 附录 1 G20 国家：相机抉择财政刺激程度（占 GDP 比重）	211
附录 2 2008 年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重点和核心经济指标	212
附录 3 1998—2012 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基调	213
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6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部门主动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相机抉择策略日臻完善，然而至今尚缺乏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政策评价研究，本研究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同时我们还看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公共财政管理改革也为 2008 年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发挥奠定了扎实的微观管理基础，发挥了显著的“财政管理乘数”效应。

本研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一项政策性研究，主要针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系统评价，通过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系统分析，使我们在整体上对中国积极财政的政策效果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广义的“积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都是积极的，这有别于狭义的“积极”即国外所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因此，本书不吝用大量的篇幅和数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效果，也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中国财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和巨大贡献。

从结构安排上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部分，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出发，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其实施的微观基础进行了详细说明，肯定了多年来财政支出管理改革所带来的“财政管理乘数”效应。第二部分，对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国内外背景、政策内容进行介绍，突出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特征。第三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首先介绍一些分析方法，然后从财政收支与 GDP 的关系、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预算内投资和非国有经济投资、财税政策和信心指数、财税政策的反周期性效果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对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进行系统研究。第五部分，初步探讨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问题，分析了淡出的路径和时机及退出策略。第六部分，积极财

政政策所引发的一些思考。

本研究充分利用了当前国内外可得各类期刊文献和数据统计资料,选择了适当的数理分析工具,力图基于翔实而系统的实证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做出初步的科学评价,同时也为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提出作者粗浅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特色包括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系统分析视角,综合考察了财政政策的经济效率和稳定性功能效果,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消费、GDP、信心指数等的作用效果,努力做到“言必有证,论必有据”。同时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于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原则和策略进行初步探讨。

本研究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或观点如下:

1.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政府支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合理性。

2. 财政支出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产出增加在第1个季度后增加0.89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在第1个季度先下降0.71个百分点,之后有波动但是总趋势是递减。而且季度数据模型表明,财政政策作用效果也有季度效应,而且效果递减。

3. 长期来看,政府消费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会增加0.86个百分点。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30,而且调整显著;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30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方差分解表明,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解释程度都很高,政府消费的扩大对居民消费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拉动作用。

4. 长期来看,政府消费支出增加1个百分点,GDP会增加0.21个百分点,但是不显著;政府消费支出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微乎其微,方差分解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解释程度并不高。

5. 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动非国有经济投资增加1.67个百分点。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09,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09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误差修正项系数大小说明该模型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并不是很大。方差分解表明,政府投资对非国有投资的解释程度很大,政府投资的扩大对非国有经济投资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拉动作用。

6. 财税政策和信心指数分析：(1) 宏观税负波动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波动的格兰杰原因，显著性水平至少为 1%；宏观税负波动是企业家信心指数波动的格兰杰原因，显著性水平至少为 5%；政府规模波动不是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波动的格兰杰原因。(2) 所得税税负波动是企业家信心指数波动的格兰杰原因，不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波动的格兰杰原因；流转税负不是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波动的格兰杰原因。(3) 整体宏观税负的变化不利于稳定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增大宏观税负会加大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的波动；所得税税负的变化对于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影响至少持续 1 年半，而且增加所得税税负会降低企业家信心。(4) 企业所得税税负对企业家信心指数波动变化具有相当的解释能力。

7. 2009 年，周期性赤字变化率总初始赤字变化率都是一致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不变财税制度下经济周期所造成的财政平衡效果是扩大赤字。

8. 近年来，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日臻成熟，使用频率在不断提高，对改进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稳定经济波动的功能尚不突出，效果尚不显著。

9. 中国的赤字结构并不是十分合理，主要反映在较高的结构化赤字 (structural deficit) 比例中，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前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政府相机抉择的行为过于频繁，有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自动稳定器功能不强，意味着财政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10. 宏观经济先导指标表明，尽管经济有波动，但最近一年来中国经济基本面逐步向好；然而，一些隐忧仍然存在。

11.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是显性赤字率接近 3%，国债负担率为 19% 左右，仍处于风险可控范围内。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加剧，不同研究者的数据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加速了地方债务的累积，不利于未来债务风险的化解。如何消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开放地方债券市场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三是在合理的参数假定下，模拟测算当前中国可持续的财政初始赤字率在 2.32% ~ 2.34%；2007—2011 年，实际初始赤字率除了 2009 年外，基本都处于可持续区间内；根据财政部的 2012 年预算收支以及债务利息支出安排，估算的初始赤字率为 1.63%，仍然处于可持续范围内，可以扩大的债务增量规模有 3635.4 亿元，尽管与 2008 年相比有限，但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作用空间。此外，从代际核算角度看待财政预算平

衡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12. 积极财政政策在未来要逐步淡出，需要谨慎、循序渐进地小幅进行；需要对历史、现实、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必须直面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把握好财政政策调整的时机、力度、节奏和重点。既要短期应对，又要立足长远；既要调节需求，又有调节供给；既要平衡内部，也要平衡外部；既要突出优势，又要搭配协调；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客观地说，国内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研究还涉及很多领域，本研究也有自身的局限。但是笔者试图用一些新的方法和视角探讨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及效果，笔者无意为政府行为刻意辩护，只是力图用科学的分析、坚实的论据形成一家之见；同时，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时至今日，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仍未消失，全球经济复苏仍在缓慢进行中；中国经济在困境中率先复苏实属不易。然而，我们仍然要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发达国家的通缩与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愈演愈烈的汇率战、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能源与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不断凸显；全球性经济结构的失衡乃是此次危机的病根所在，全球经济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再平衡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全球经济全面复苏有待时日，这更需要各国的协调与配合；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探索新的道路。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结构性失衡是突出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尚不能马上完全“功成身退”，还需要为各项改革保驾护航，随着经济形势好转而逐步淡出。当然，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就必须对财政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财政的稳健成长。

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与发展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转向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成为颇为流行的话语，与此同时，庞大的政府资金投入也让各国经济学界和实务界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不断地产生质疑，迄今为止这种争论仍在持续。历史上中国曾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二次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如何看待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将直接影响人们对政策效果的评判。当然，对于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分析必须要立足中国国情，毕竟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本章将着重阐述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和内涵，并结合中国现实进行剖析。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界定

1. 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

维基百科全书（wikipedia）对财政政策的定义是“财政政策是使用政府收支手段来影响经济的行为，与货币政策利用利率和货币供给来稳定经济相比，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支出和税收。政府税收以及支出规模和结构的改变都会对经济产生下面三个方面的影响，即总需求以及经济活动水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税收、国债、经常支出、资本支出、转移支付、贴息等手段。

积极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主动利用各种财政税收手段来调控经济的各类政策。“积极的”（active）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主动进行干预，它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姿态。政府在经济下滑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

型财政政策，以此来减少经济波动幅度，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型财政政策（减税增支）、紧缩型财政政策（增税减支）以及中性财政政策（收支平衡）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要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

积极财政政策在经济学理论中主要源自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他通过对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持续 10 年之久的高失业率观察，改变了其对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经济体快速自动恢复的观点。在其名著《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中，凯恩斯明确表明他对资本主义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机制的质疑，否认了萨伊的供给决定需求学说，主张政府主动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凯恩斯模型对于政策而言有两个重要概念：第一，“凯恩斯乘数”效应，首先由卡恩于 1931 年提出。任何外生的支出增长对需求都会产生推动作用，例如政府支出的乘数作用直到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因此，政府会采用比较温和的支出来刺激一系列新的生产活动：如果政府支出，人们就会得到这些货币并将其消费和储蓄。这种额外的支出还使得企业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并提高他们的收入，这又会进一步提高消费，这种过程循环往复。在每一次循环中，支出增加都小于上一循环的，因此乘数效应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步降低，直到出现一种均衡。如果考虑国外部门和税收，随着进口增加和每一步的税收增加，这会减少消费并降低乘数效应。第二，凯恩斯重新分析了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效应。在古典模型中，资金供给（储蓄）决定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凯恩斯认为，投资规模更多的是受长期利润预期影响，受利率影响程度较小。后者开启了通过改变货币供给的货币政策。在大萧条期间，凯恩斯认为，与财政政策相比这种方法是无效的。但是在更为正常的年代中，货币扩张能够刺激经济，主要通过刺激新建住房投资。

2. 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定位

与一般的财政政策相比，积极财政政策功能定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拉动经济增长，通过各种乘数效应，恢复人们的信心以及经济活力，使

经济走出低谷。二是反周期性（countercyclical），也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减缓产出波动，这个需要决策者认真考虑，要把自动稳定器职能和相机抉择职能充分配合，尤其要发挥前者的职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需要满足三“T”原则，即及时性（timely）、针对性（targeted）和暂时性（temporary）。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满足这三个原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经济衰退期间，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往往没有货币政策使用得频繁，而且经常会滞后。

一般来说，相机抉择政策效果弱于自动稳定器所带来的激励效果，而且相机抉择的政策往往会过度，例如，在经济困难时期减税和增支幅度往往超过经济繁荣时期的增税和减支幅度。这意味着债务将会持续上升，相比之下，自动稳定器的一个明显优势就是他们会对经济周期变化做出对称的反应。自动稳定器反应及时而且对称，当经济波动造成产出增加或减少，税收收入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这说明它们和相机抉择政策相比具有自然的优势，亦即经济周期中政府债务将一直保持稳定。但是，通常自动稳定器是长期社会发展目标的副产品，而非有意设计用于对付周期波动的工具。的确，决策者能够观察到自动稳定器的设计是否可以带来更强的稳定效果。例如，税收、转移支付或是支出项目是否和经济状况直接相连，政府也要通过各种机制设计来增加自动稳定器的范围和有效性。另一个可能是用增加公信力的相机举措，例如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来减少债务偏差目标，更加注重对经济状况评价的透明度以及更加关注财政政策的长期效果。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组合也很重要，一般认为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大于增支。同时，财政政策还要与货币政策保持协调一致，因为支出的增加会对物价造成压力。此外，还要考虑财政政策对汇率的影响，保持国内外经济的平衡。总的来说，政府要通过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政策设计来形成合力以应对周期的不利变化，努力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减少经济和财政风险。

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争论

如同生物体一样，经济体也有起伏不定的周期行为，问题在于这种周期性波动是否可以自动恢复？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视为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稳定机制，市场“看不见的手”会让经济重新恢复充分就业。英国经济学家庇

古在其名著《工业波动》中总结了六种导致周期的因素，包括乐观和悲观错误、天气导致的农业产出波动、新发明引起的生产变动、货币波动、工业争端和消费偏好的变化。当时人们多数认为在这六种之一因素扰动下，经济将快速回到充分就业状态。人们对这一观点的认同，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发生。

现代意义上的积极财政政策，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通过启动全面的财政手段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回升并取得了积极成效。而此后凯恩斯于 1936 年发表了《通论》则宣告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他深入论述了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强调了总需求不足是导致大萧条的重要原因，因而对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提出了质疑，认为市场经济无法完全消除非自愿失业现象，要想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总产出和就业水平，为了调节总需求，积极的政策干预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不可避免。《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凯恩斯的理论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发展，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主流学派，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多数宏观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主义模型似乎是该领域中唯一的理论”（巴罗，1980a）。

与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分析相比，财政刺激（赤字支出）会推动生产。但是对这些学派而言，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刺激无“挤出”非国有投资的副作用。首先，刺激政策会提高对劳动的需求进而提高工资，这会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其次，政府赤字会增加政府债券存量，这会降低它们的市场价格并鼓励高利率，这使企业投融资能力下降。因此刺激经济的努力可能会伤及自身，更严重的是，这会将一些私人部门生产所需的资源转移到政府部门，后者的资金使用效率并不高。而凯恩斯认为，首先，当失业持续高企（超过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时，这种财政政策就是合适的，它的挤出效应不大。而且，非国有投资还会被“挤入”：财政刺激扩大了商品市场范围，提高了资金流动性和企业利润，带动了商业乐观情绪。对凯恩斯而言，这种加速效应意味着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替代。其次，当财政刺激发生时，GDP 会增加，这会提高储蓄，有助于为固定资产投资融资。最后，政府支出也并不都是浪费的：政府提供那些私人部门无法提供的公共品会有助于私人部门的增长，例如，政府对基础研究、公共卫生、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入都有助于潜在产出的长期增长。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古典和